

21世紀大中華叢書

2

中國的民主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黎安友 / 主編
姜敬寬 /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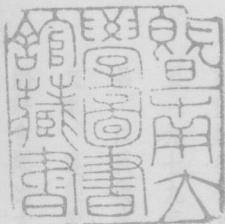
724901

港台書室

D609.9
953

廿 一 世 紀 大 中 華 叢 書 ②

中國的民主



90105204

黎安友／著
姜敬寬／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中國的民主

CHINESE DEMOCRACY

原著者／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譯者／姜敬寬

責任編輯／林瑞祥

助理編輯／盧瑞卿

校對者／柯賢泱

封面設計／葛雷設計工作室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7055066 (代表號)

傳真：7066100

劃撥：0106895-3

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發行人／楊榮川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申豐實業有限公司

印刷／三聖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信成裝訂行

中華民國 83 年 1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0748-4

基本定價 6.4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譯

者

的

話

這本書早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當時讀過之後我就立刻用英文寫了一篇書評介紹，發表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份的英文《自由中國評論》上。同時，並與作者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直接聯繫，徵得他的同意，開始作翻譯成中文的嘗試。

不料，序言譯成之後，第一章的「民主運動」立刻便給我很大的困擾，因為作者引用了許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九年之間大陸上地下油印刊物上所發表的作品，以及後來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所貼的大字報上的文章。這些中文的還原使我不敢貿然從英文直譯，否則將會鬧出大笑話，而且不會真實。於是我就再向黎安友教授要求他的協助，他很慷慨地把所採用的廿一套由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編印的「大陸地下刊物彙編」全部借給我參考。果然幫助很大，我便一口氣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譯完。

有了序言和本書的前兩章譯文之後，我就開始尋

求出版者。最初是希望由「中國時報」當時在美國的負責主編周天瑞先生代為商洽，經過他的努力，結果把第一章的譯文在台北出版的《時報雜誌》及美洲的《時報周刊》上先節錄發表了，出版全書的事卻一直沒有下文。後來雖然再經過直接、間接地與其他出版公司聯絡，也都不得要領，於是我便把翻譯全書的計畫擱置了下來。

直到一九九一年七月，經過台大教授周陽山先生的推介，時任五南出版公司的總編輯胡祖慶先生藉來紐約參加書展之便，才正式商妥出版事宜。得到他們兩位的鼓勵，我於是再提起筆來趕譯本書的其餘各章。其中以第三第四兩章所費時間較多，因為書中所引用的梁啟超文字特多，手邊雖有一本《飲冰室全集》，但作者卻是參考的「飲冰室文集」，全套十六冊，所以翻查對照頗為不便。於是承胡總編輯的協助，從台北購買到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套「飲冰室文集」，對還原梁啟超的引語，幫助很大，在此特別向胡先生申謝。

關於此書中其他引語——包括黃宗義、毛澤東、鄧小平……等著名人物——由於作者所採用的參考資料多是英文著作，並沒有指出原文的出處，加上中文書缺少「索引」，每有引語，即使得到他們的「語錄」或文集，也很難找出原文對照，有些像海底撈針一樣難得，於是祇好從英文直譯，實非得已。幸好這些英文的翻譯引言，大都非常忠實、簡明，因此轉譯成中文時並沒有太大困難，祇是和真正的原文一定頗有出入，特此向讀者表示萬分歉意，如有誤譯之處，尚請指正、見諒。

姜敬寬謹識

中

文

版

序

每

一位作者在寫作時總是心存著讀者的圖象。雖然《中國的民主》這本書是為美國讀者而寫的，但我卻不斷地想著中國的讀者對我的分析會有怎樣的反應。本書的主題是關於歷史和政治，但基本上它是一本有關文化的書——也就是說，關於價值與觀念的書。這是一個外國人的嘗試，發掘出「民主」對中國人有怎樣的意義。

當然，民主——就像任何其他複雜的觀念一樣——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在不同時間下對不同的人民會有不同的指涉。像本書這樣的探索，它的目的並不可能是找到一個對所有中國人而言都適合的單一、簡單的意義，並與在西方一直沿用的單一意義做對照。但是，如果我們只是說，民主在不同時空之下會有不同的意義，這也是失之無用的。

我所試圖做的，是將假設與定義置於較深的層次，以這些假設小定義做為工具，一個文化中的成員藉此

對民主這樣的議題進行對辯。我的信念是，在一個文化中，有關人性、政治利益、國家、法律、權利這些基本思考方式，通常是共有的，而且和支持這種或反對那種政策或意識形態的態度相較起來，這些基本思考方式的變遷是緩慢得多的。這些深層的假設，很容易被討論對象的文化成員所忽略，而且也很容易被其他文化的成員所誤解，這是因為它們很少被明確地解釋過，也是因為它們與眾不同的特質，被所有現代文化中相類似的辭彙(terminology)所掩蓋了。舉例來說，民主這個名詞本身，以及其他語言中相對等的用語，目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著，但是如果我們以為由於人們使用著相同的辭彙，因而也就是指涉著相同事情的話，那就是虛幻的假設了。

我採用了中國某些高潮時期有關民主的討論材料——尤其是晚清與民主牆時期——並試圖向美國讀者解釋，在這些論辯中，透露了那些有關政治的基本觀念。我認為在這些論辯中，所有的參與者——改革者與反動派，民主活動家與保守的官僚——都接受了一些共同的觀念和價值，這些都是獨見於中國，卻與普見於西方的，迥然不同。這些共有的觀念並不意味中國永遠不會成為民主的國家，但卻有可能使中國的民主在某些重要方向上迥異於西方。

本書出版於六年之前。從那時起，另一場更為壯闊的民主運動在中國爆發了，而在台灣，民主的進展使得第一次真正的「中國的民主」趨於實現。今天，反民主的力量依然在大陸得勢。但是許多跡象顯示，社會主義體系已經削弱，支持民主的力量卻逐漸強大，而民主轉型將會在鄧小平死後某一時刻開展。

中國的民主轉型將是綿長而不穩定的。它要經過很長時期的掙扎才能找尋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問題的途徑，並設計出人民所能接納的新政治制度。在此一掙扎之中，舊的論辯中所顯露的觀念將會發生變化，但是變化之後，他們還會繼續塑造著未來。

我很慶幸自己的書能在這一令人鼓舞的時刻以中文的形式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我希望讀者能夠原諒一個外國人不可避免的錯誤和誤解，因為他無法完備地理解中國廣闊而複雜的歷史、思想與文化。我也希望讀者能了解本書有時會解釋一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事情，但是，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解說卻是必需的。解釋這些明顯的事情正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主釋者的主要任務。我要特別感謝姜敬寬先生從事這份具挑戰性的翻譯工作，也要感謝周陽山先生鼓勵並安排本書的出版事宜。

黎安友

謹序

Andrew Nathan

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

Chinese Democracy

Andrew J. Nathan

Copyright © 1985 by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4 by Wu Nan Book Company,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的民主 /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著;
姜敬寬譯. -- 初版. -- 臺北市: 五南, 民
83

面; 公分. -- (廿一世紀大中華叢書;
2)

譯自: Chinese democracy

ISBN 957-11-0748-4(平裝)

1. 政治 - 中國 - 歷史

570.92

82009700

元本定價
(此書由五南出版, 本公司負責發售)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目

次

譯者的話	一
中文版序	一
前言	十一
第1章 民主運動	五三
第2章 官定極限	七一
第3章 梁啓超與中國民主傳統	一〇一
第4章 民主與官僚主義	一二七
第5章 向共產黨獨裁挑戰	一五七
第6章 中國憲法傳統中的政治權利	一九一
第7章 宣傳的勃興	二一九
第8章 爲國家服務的媒介	二四三
第9章 重新贏回大眾	二七一
第10章 一九八〇年的選舉	三一
結 論 中國的民主與西方的價值觀	三二五
跋——編者的說明	

前

言

我

們生活在民主時代。軍人和一黨專政的政府也都舉辦選舉或公民投票以表示他們的統治是得到人民同意的。現存的幾個君主也聲言他們是爲了替人民服務而存在。但是，這些政府儘管努力在表面上求得類似，而在根底上卻完全不同。祇有把每一個民主加以互相比較，我們才能看出它們的理論價值和實踐的動向。如果要想更深一層地了解我們（指美國）和其他文化在基本上有那些異同之處，我們便必須揭示出一般國際上語文的假象。這樣的研究會使我們對自己現有的特殊價值重新評估，同時也考驗我們所相信的究竟是什麼。爲了這些目的，本書所探討的就是中國大陸民主的意義——一個自稱民主並普遍被認爲是民主模範的國家——並藉此用以對照美國理想的（民主）背景。

從世界的觀點看，美國式的民主比中國式的更爲特殊。我們所強調的人權，我們在政治上對互相衝突

和敵對意見的容忍，我們承認任何個人或團體都能合法地循政治途徑以迫使政府尊重私人的利益，以及我們的司法審查制度等，都是與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所不同的。相反地，中國的制度卻屬於社會主義的以及其他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大系統，他們的共同點包括一種政治哲學，認為公民與國家之間應該和諧而不應對峙，一黨領導，公共的利益高於公民的權力，而政府有權不受司法機構的干涉，隨意制定它所認為必要的法律。這些國家認為他們的制度要勝過西方國家的「小資產民主」制度。用鄧小平的話說，他們就是希望創造出「一個更高級而在實質上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

同時，中國的民主也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式的翻版。中國人傾向於他們所了解的民主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已具有民主七十多年，而在最近的三十五年中並曾實際上是歷史最有參與性的社會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被解釋為和一個世紀的民主思想傳統相吻合的。本書的一部分內容即將用於探討這個傳統。

中國民主的發端，像其他此類事件的發端一樣，可以追溯到一八九五年。直到那年為止，中國的政治是完全屬於官僚而與人民無關的。企圖影響政策的建議書（或「陳情表」）祇能透過官方的管道呈送到北京的朝廷。皇帝每日批閱文件，用硃筆加評語。他的決定便以詔書的形式被抄錄、被登記，然後再由官方的郵遞方式傳達到下屬官僚。平常祇有高級官員才能提建議書，也祇有直接對他們有關的事才會被提出來上告。

在危急關頭，政治參與的機會也可能會延伸到低級官員，甚至不做官的文士。皇上可能選擇「廣

開言路」，暗示一般官員准許在他們職責以外呈報意見，而平常沒有權力上奏的低級官員也可以向他們的上級提出意見。低級的文士們通常便利用這種機會向宮廷的諫官提出無限制的辱罵。稱他們的意見爲「清議」，文士之間互相交換書信或詩辭以宣洩他們的恩怨。但是，從康有爲和梁啓超早期的經驗證明——這兩位文士中最後的輿論製造者——他們發生影響力的希望仍在皇帝。當皇帝聽夠了，他便用懲罰幾個建言者的方式再關閉「言路」。

直到一八九五年，才有許多官僚以外的文士，開始爭取他們影響政府政策和人事的合法權益。在那一年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中日戰爭以及戰後的談判引起學生、商人和官僚以外的知識份子對國事的關心，深深促使他們相信國家民族的存亡決不再能單獨由官員們一手包辦。社會、思想和政治變遷，由此加速。中國人開始增派代表團和學生出國學習，建築鐵路和電訊，清掃城市，擴建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改革教育制度和軍隊，並始創地方選舉和議會。對外國觀察家來說，中國便好像突然現代化了。

政治辯論逐漸以新興起的大衆爲對象，據我的估計，這批新覺醒的大衆在晚清時期約有二百萬至四百萬人（見第七章）。那時候討論的包括一切意理（ideologies）和機構。譬如「主權」、「公民」、「憲法」和「民主」等名辭都開始被普遍地使用於日常字彙中。一個政客不僅可以爭取到皇帝的注意而發生影響力，同時也可以激起輿論，施以壓力。改革派和革命派都創辦十幾種報紙和雜誌，雖然這些刊

物都集中在少數城市裡印刷，而它們的發行卻散佈到全國的各鄉村和城鎮。政論家們開始用新體裁寫作，政治語言於是變成簡化而具煽動性。他們犧牲細節以追求幻想，爭論代替了慎重。宣傳支配著輿論，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一九一二年後中國成為共和國，幾乎所有有政治覺醒的中國人都同意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但是政治思想家們對民主與人民權利和義務的觀念卻各有異議。在歐洲，中產階級用財政和政治實力建立他們在政府裡的發言權。但是當民主的觀念傳到中國時，它卻被解釋為一種時髦的裝飾品和統治者的資本，而不完全是西方早已肯定的一套。中國廿世紀裡每一個階段的發展，當局都似乎把主要的任務交給尚未成熟的大眾輿論去承擔，而不像在西方，由每個新階級去為他們自己的權力而奮鬥。結果大眾祇有名義上的權利而卻無實際的影響力。

自從一九一一年滿清被推翻以後，每次的憲法中都承認人民是有主權的。軍閥和獨裁者便用他們自己的人製造一種假定的大眾要求，然後用這種要求去證明他們所採取的行動，確有必要。同時，統治者更企圖以各種方式限制任何大眾可能對他們的干涉。一八九五年滿清的宮廷，壓制研究會並迫使改革報刊的發行人們向各省逃避。一九〇五年當商人們發動全國性的反美杯葛 (boycott) 以抗議美國法律限制華人移民時，中國政府便以該運動違法而且危險，企圖加以制止。一九〇六年朝廷宣佈有意制定一部憲法，並召集國會，但隨之而起的簽名運動，要求早日立憲，卻立刻遭受取締。一九一一年皇帝雖然被當時各種勢力的聯合而推翻了，而政府卻仍然被舊官僚中的份子所控制。一九一二和一九

二三年的憲法都限制祇有少部分人才有選舉權，而國會的權力更是有限得很。

中國歷史家們一般都承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使中國革命的民主力量發生了支配力。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憲法才取消選舉權中的財產條件限制。政治文件也開始用白話而不用文言。政治中的兩個概念——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支配了知識份子的辯論。學生、商人、工人，甚至農民也都逐漸捲入到政治的漩渦。

不過當權的人卻繼續使大眾無法真正地影響政府。不論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統治大陸的國民黨或現在的共產黨，它們都是集權和列寧式的政黨。它們都容許其他小黨的存在，卻防止這些小黨與之抗衡；除了它們自己設立的任何利益團體之外，一概不鼓勵存在；用合法的限制，威脅或直接管理等方式控制新聞；並設立一種政治制度，其中行政機構成為黨的工具同時並駕御司法機構，使之獨立於立法機構之外。國共兩黨都認為民主是促進國強民富的方法，而與大眾控制政府無關。兩黨都以中國的落後為藉口以實行獨裁，他們並說獨裁是對人民有利的。

每個黨內的改革派和黨外的批評者都說祇有人民真正有了實權，民主的實惠才得實現。但是因為中國長期地為了爭取國家的生存，這種批評的傳統卻一直很弱。到了毛澤東時代，這個傳統似乎完全中斷。毛本人雖然也談民主，而他所謂的民主祇不過是在一個國家領袖單獨指導下由群眾監督官僚而已。權力緊密地集中在領袖的智囊圈內，而人民生活的全部則分別由經濟管制、警察監視、政治督導、以及宣傳人員所控制。不像蘇聯和東歐，中共是沒有持異見者的運動的，也看不出權力分配的問題對

人民仍有吸引力的跡象。

一九七六年毛死之後，他最親近的追隨者被捕。權力落到鄧小平手中——一位曾經被毛罵爲「走資派」的領袖。共產黨宣佈，凡是自土地改革到「文革」這期間所發生的所有不公正的判決，都決定加以平反。它也下令改變農村的人民公社、教育機構、工廠和法院等組織。數年之內，中共並公布對毛的歷史角色和貢獻加以重估的結果，推進了地方性人民代表大會的新選舉，以及通過新的黨章和國家憲法。中國人民深深了解他們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爲依據，他們也了解共產主義在南斯拉夫和波蘭也曾被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釋過，並試驗由獨立的工會和共產黨的統治同時並存。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這幾年使他們對歷史性的轉變寄予很大希望。

一九七八年一個小規模的民主運動重新揭示出一個老問題：究竟一個強大的政府如何才能與下面的人民所行使的影響力加以協調。和晚清的情況正好相反，當政者不是一個腐敗的宮廷而是共產黨。活動份子也不是年輕的知識份子而是學生和工人，他們不直接向上級呈遞建議書而在牆上貼大字報和編寫油印刊物，同時他們更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卻不再是儒家學者的身份。但是這些民主份子所提出的問題卻在一百年以前已有人提出過，譬如：國家爲什麼落後？統治者如何才能起用人才使國家振興？以及如何使公衆的參與和強大的政府當局取得協調等等。甚至於他們所用的文字也和晚清時的改革者很相似。他們和中共的辯論以及他們之間的爭論都只能用歷史的透視法才能得到了解。

中國大陸的民主這個題目實在太大，要用編年法處理是很難的。因此我便採用一種交替方式，在